

中亚史资料丛刊

中亚蒙兀儿史

——拉失德史

第一 编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 著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译
王治来 校注



新疆人民出版社

汉译本出版说明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波斯文著作《拉失德史》，是关于十六世纪新疆和中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迄至目前为止，此书在世界上只有英文译本。英译本由罗斯翻译，伊莱亚斯编辑，于1895年初次问世。以后，在1898年出了第二版。1972年重印。1972年重印本同前两版的区别仅在于：将正标题《拉失德史》改为副标题，而将原来的副题《中亚蒙兀儿史》作为书名，前面增加了一篇由伊莱亚斯写的《重印序言》，说明这样改动仅仅是为了让人易于明白书的内容和便于图书馆的分类和编目；在附录中增加了一篇关于呼罗珊现存蒙兀儿聚居区的附记和一个勘误表；再就是对索引中的错误一一作了更正。

《拉失德史》的这个汉文译本，是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1965年组织翻译的，当时根据的英文本是1895年那个初版本。现在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将它分成第一、二两编相继出版。出版前曾由王治来同志根据1972年重印本进行了校对、部分改译、补译、文字润色，并作了《校记》。

英译本再版序

在《拉失德史》再版之前，有几句话需要说一下。第一，必须指出的是，这不能说是一个新版本，不过是改换一个更方便、更明瞭的标题的重印本，在后面加了一个关于呼罗珊现存的蒙兀儿聚居区的附记和一个勘误表等。标题的全文并没有改动，只是换了次序，因为原书的波斯文标题（尽管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标题）附在英文译本上，看来没有什么意义，反而给分类与编目带来很大的不便。象《蒙兀儿史》这样一个简单的标题将是更吸引人的，但鉴于“蒙兀儿”一名普通都是用来指印度的统治者（他们系出自中亚蒙兀儿人的一支），这个名称就可能张冠李戴，也可能令人以为是指那个与此书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的王朝。现在将标题作如此变动，我希望它能充分表达米儿咱·海答儿的意旨，而且这样也是很确切的。

N·伊莱亚斯

1897年1月

英译本编者序言

《拉失德史》虽然是第一次译成英文公之于世，但是必须说明的是，翻译家和历史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早已多少利用过此书作为史料来源。作为一部蒙兀儿人的历史，其所考察的范围和要旨为东方学家们所熟悉已经快五十年了；非仅止此，它的内容有许多曾零散地发表过，历史论文的某些段落中亦常见引用它来作论据。英国著作的情况如此，而研究中亚史的欧陆作家的著作亦复如是。此书的价值尽管已经这样间接地得到了承认，可是它至今还没有一部任何欧洲文字的全译本译出来。

就我所能确知的说，东印度公司已故的W·厄斯金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翻译的是最近乎完备的译文，约于《巴布尔回忆录》出版后十四年左右译出。但是，厄斯金先生的译文始终没有付印，在英国博物馆写本部以外，似乎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它似乎是在1840年他从东印度公司退职以后着手翻译，并于第二年初译完的^①。该手稿计有二百二十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对开页，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了《拉失德史》的大部分。但是，这个译稿的文字变动很大：在某些地方，译者竭力全面而准确地翻译了原文，这些译文如此煞费心机地译出，看来是打算出版的；而在其他一些地方，译者却把大段大段的文章（有时是整个的对开页）做成比较简明的摘要；另有一些地方，译者只用单纯的提要或标题来表示原著的大意；最后，在很多地方此书的许多章节完全被删掉了。

因此，这份文献虽然很宝贵，却很难看做是《拉失德史》

^① 从一个页边的注记看來，他是在1841年1月4日完成这一工作的。该手稿在英国博物馆的编号为Add. 26612.

的一个译本。经仔细阅读之后，我认为厄斯金先生的译稿不是为了给米儿咱·海答儿所写的历史提供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而是为了某种其他特殊的用途。厄斯金先生究竟是否曾经打算用英文出版《拉失德史》的译本，现在无从得知，但是就英国博物馆所藏手抄本的某些有关情况来看，我猜想他的翻译是打算作为他所编纂的第二部巨著《蒙兀儿(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史》的准备资料；该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仅完成的两卷)于1854年问世。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原因是：第一，《拉失德史》中专门叙述蒙兀儿诸汗和他们的交往事迹等王朝史的章节往往正是手稿中全译的部分；第二，这两卷《印度史》不仅经常征引《拉失德史》，而且有许多部分是逐字抄录手抄本中的段落；同时这位著者在序言中说，他对蒙兀儿人及其编年史的了解，主要是根据米儿咱·海答儿的书而来的。的确，厄斯金先生的绪论的大部分就是蒙兀儿编年史的提要，这编年史是米儿咱·海答儿、而且仅仅是米儿咱·海答儿所著，因为其他的亚洲作家涉及这一主题只不过是附带地提一提而已。第三，与《拉失德史》的片段译文装订在一起的还有另一手稿，那就是厄斯金先生手写的木塔马德汗《奉只罕杰儿命撰阿克巴实录》第三卷的类似的摘要译文，厄斯金先生似乎是为了要写另一卷(可能是第四卷)《印度史》才研究这部作品的。因此，《拉失德史》摘要(如果可以叫做摘要的话)很可能是著者那时计划编写一些历史著作时作个初步研究资料而草拟的；情况如果是这样，这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表明厄斯金先生对工作之谨慎而又彻底，因为仅仅准备这个材料似乎就需要有将近一年的劳动，而《拉失德史》只不过是厄斯金先生根据原文进行研究并加引用的许多东方文字的权威著作中的一种而已，他所写的历史中的脚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这部《摘要》译文除了为其译者本人所用以外，H·霍渥斯爵士的著作中有许多非常宝贵的资料也是从这里面引来的，霍渥

斯爵士对于一切可靠的原始资料不论多么难以到手，也从不放过。特别是在他所著的《蒙古史》中，霍渥斯搜集了有关中亚各部落和蒙兀儿诸汗世系的大量资料，他根据这个文献中所找的到米儿咱·海答儿的资料，得以搞清了亚洲史上最不清楚的段落。要是这个文献更加完全，要是在厄斯金先生的时代对于中亚地理和民族学的了解有现在这样清楚，那么《蒙古史》毫无疑问将包括《拉失德史》的一切主要部分，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情留待本译本的编者来做了。但正是在最近五十年间，这些问题有很多地方被弄清楚了，所以厄斯金先生由于不了解而留下来没译或是译得不明确的大量史实，目前根据较现代的知识就很容易加以补充。

除了厄斯金先生以外，广泛引用《拉失德史》的波斯文原本的英国著述家只有故军医署长W·H·贝略一个人。1873年，贝略博士随同D·福赛思爵士的使团到达喀什噶尔，并且编纂了一部《东突厥斯坦史》，作为该使团正式报告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对于米儿咱·海答儿所述的那个时期，大部分是引用海答儿的著作。贝略博士既未曾想要翻译《拉失德史》，亦不关心该书中同使团报告所提到的国家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因此，他的历史只是根据米儿咱·海答儿著作的某些部分编成的，这书尽管某些地方非常详尽，但即使作为《拉失德史》的“摘要”来看，也不能同英国博物馆所存的厄斯金手稿相比。就某些方面来说——例如就地名和地理说明方面来说，它或许比厄斯金的文稿更为可贵，因为贝略博士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且有机会向当地人探询，这就使他能明显地胜过早期的译者。 viii

同样，R·B·肖先生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任职时，也曾经研究了本书的一部分，而且翻译了其中的几节，发表在1876年的《地理学会学报》上。这些章节与历史无关，而完全是谈论东突厥斯坦及其南部和西南部邻近地区的地理，其中包括翻译过来了

的米儿咱·海答儿的见解之摘引，这些见解经R·B·肖先生根据现代有关这一主题的知识和当地资料做了充分而又精确的解释。

《拉失德史》另有一小部分，见于埃利奥特所著《印度作家所述的印度史》中，这部历史是由许多译者从亚洲著作中摘译有关印度史的引文然后编成的。上述译文是道森教授翻译的，其中包括1540年曲女城战役纪实，在那次战役中爱乌罕（阿富汗）人在瑟尔沙统率下一度战胜了所谓印度斯坦的莫卧儿帝国。但连这一点也没摘录完全，编者只把自己认为对于阐明该战役时代的局势有必要的战况实录摘了下来，某些较长的段落都被删去，其中包括米儿咱·海答儿对于莫卧儿人在那个危险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看法。

还有一位穆尔克罗夫特先生与本书有关，至于他是否引用过本书，从他死后由H·H·威尔逊教授发表的那本《游记》中是看不出来的。他只有一次提到了米儿咱·海答儿的名字，说某一件有关克失迷儿（克什米尔）的记载是属于这位作家的，却不曾直接引用他的著作。然而，假如穆尔克罗夫特确实知道《拉失德史》，那么他就可能是知道这本书的第一个英国人，因为他引用这本书的日期是1822年。

我相信，俄国的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在编纂里特《地理学》的俄译本时，曾使用过《拉失德史》，俄国的其他东方学家也可能用他们的本国语文翻译过《拉失德史》的某些部分^①；但是据

① 校记：在B·B·维里雅米诺夫·泽尔诺夫的《哈斯木系诸王的研究》一书的第二部分中曾大量摘引《拉失德史》。瓦理汗诺夫在《准噶尔地区概况》一文中说：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藏有《拉失德史》的突厥文译本。在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藏有波斯文原本。可惜科学院的本子不全，而彼得堡大学的本子则错误百出，这显然是不懂波斯文的人抄错了（见《瓦理汗诺夫著作选辑》，1958年，俄文版，第99页）。当时这些人为了沙皇俄国扩张侵略的需要，利用这部书以研究中亚和新疆的历史。巴尔托里德曾使用过俄国亚洲博物馆所藏《拉失德史》的三个手抄本。

我了解，法国和德国的东方学文献只不过仅仅提到过这本书，而且连提到的时候也很少。不过我这样说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那里很可能已经发表了这本书的引文，只不过我没见到而已。

就这本书的波斯文原本（米儿咱·海答儿是用波斯文写的）来说，在欧洲虽然不特别稀罕，但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在亚洲各国却很难找到。在英格兰，英国博物馆就存有三部抄本，其中一部属于剑桥大学的考埃尔教授所有，看来至少还有三四部在私人手里收藏着。但是这些抄本并非都具有同等价值，无论如何，英国博物馆所存的那三本之中，有一本是现代的印度抄本，讹误残损甚多，另一本也不很完整。“英国与外国圣经公会”有两本译成突厥语的部分译文，该会同仁极其慷慨地把这两个译本交给英国博物馆保管，以供校订本英译本之用。但是，这两个本子没有一本是完整的，其中一本仅有本书的第二编，而另一本则不过是第二编中的一部分。我听说在欧陆各公立图书馆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本子，但不知道究竟是原文本还是突厥文译本。

看来，欧洲的收藏家们只要想到亚洲的什么地方能得到书，无论如何是大大地将其搜罗殆尽了。在印度，我相信加尔各答或者其他地方的图书馆里总会有几本，但是，1891年，我托人在当地书商中寻找，结果却毫无收获。在波斯和阿富汗突厥斯坦，我从来也没听到过《拉失德史》一书，而在该书主要叙述的地区，大家自必会抢购，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那里几乎一本也没留下了；总之，从1880到1885年，我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尽力打听，只发现了上述包括该书第二编一部分的突厥文片段译本。在克什米尔，一些当地人为了给我找一本《拉失德史》，经常在竭力寻找，可是一直也没找到；然而圣经公会图书馆里所存的那一本比较完整的突厥文译本，很可能是二

十或二十五年以前由一位克什米尔文官得到的①。

就我们这个译本来说，罗斯先生主要使用的是英国博物馆编号为Add·24090的波斯原文本，并和考埃尔教授的编号Or·157的另一手抄本互相校订（考埃尔教授慨然惠借，作为此用）；关于第二编，罗斯先生还以圣经公会的两本突厥文译本中比较完整的那一本校订过。在搞清一些意义不明的章节和辨认拼写不完整或写得很糟的地名和部落名称方面，这个突厥文译本起了极大的辅助作用。这位突厥文译者是一位头脑很聪明的人物，他了解著者所提到的那些国家，而且颇有见解地阅读了原书。他经常插入一两个单词或一句句子，使文意更加明确。他时常用母音符号来拼写那些操突厥语的国家的地名，把那些地名拼写得如此清楚，即使对不出地图上的地名也使人一看就能认识。很少亚洲译者和抄写者能为现代欧洲读者做出这样的工作。唯一遗憾的是，这位匿名的学者对藏文的名字未能象对突厥文的名字那样作。这位译者在任何地方也没提到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译文末尾签署了如下的一行字：“我于1263年祝马达拉喝勒②月（Jamad II）22日在于阗（和阗）城译完此书。”——也就是在公元1845年译完的。

这个英译本是怎样问世的，它怎么会由一个不很通晓波斯文因而不能独立自译的人来定稿，是有必要加以简单说明的。早在1877年，我的朋友已故的R·B·肖先生使我初次注意到《拉失德史》，他在世时和在此书所描写的地区旅行的时候，

①校记：巴尔托里德说，至少有两个突厥文译本，一个译本的译者为穆罕默德·沙的克，译于十八世纪；另一个译本的译者佚名，系于回历1263年祝马达·勒·阿赫赖月22日（1847年6月7日）译于和阗。伊莱亚斯与罗斯据以校订译文时未用上述沙的克译的突厥文译本。

② 希吉勒历月份名因现行译法不全，故参考新版《辞海》及《元史译文证补》卷29中《天方教历考》确定，并附以外文，以免发生疑窦。——译注。

曾使用过该书的几个部分。他热烈叹服著者之才智及该书之价值，推崇之为东突厥斯坦和周围地区的“指南”。我一向知道，他曾打算在编完突厥语词汇之后，便着手翻译这本书；但是，他在1897年6月逝世了，那时，他在缅甸服务，留下刚刚编完的突厥语词汇^①。

在此后的一些年里，我都力求弄到一个本子，以为在当地波斯语教师的帮助下，凭我那一点点波斯语知识也足以搞出一部实用的暂行的英译本，尽管不能成为一部学术性的译本。但是，在我能够获得当地人帮助的那些地方和时候，都得不到现成的原文；只是在1893年我返英以后，才在英国博物馆的手稿中看到了厄斯金先生的部分译文。我最初以为，把这个文稿的残缺部分补齐，并把其中的名称等等加以校正，便可以得到一部十分完整的译本，以厄斯金先生的名义出版。可是不久我就明白了，这部手稿的大部分只是原文的摘要，某些地方非常简略，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翻译”。我还发现，除其他许多或长或短的删节以外，这部手稿还把《拉失德史》第一编中所引用的耶思德人歇里甫爱丁·阿里的《帖木儿武功记》的大

^① 这里可以指出，在我实际上也就是最近几个星期内完成这个译本之后，承蒙F·E·荣赫鹏（杨哈思班）上尉和R·B·肖先生的其他朋友的帮助，使我有一个机会检阅肖先生的某些遗稿，其中就有几篇没发表过的摘自《拉失德史》的文字，还有罕见的突厥文著作《和卓史》（和卓们的回忆录）中的某些比较完整的部分；从编年的观点看来，它是米儿咱·海答儿所著历史的续编。后一著作的译文，肖先生显然是打算早日出版的，但摘自《拉失德史》的片段看来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目的在于将来作为该书较完整译本的基础。校记：由沙俄派遣于1858—1859年到新疆进行间谍考察的瓦理汗诺夫上尉在南疆的喀什噶尔就曾盗窃到一本《和卓史》（Tuzkira-i-khwajagan），后来，他在《准噶尔地区概况》一文中曾谈到书的内容是和卓的王朝史，叙述到1758年清军攻占叶尔羌时为止。从编年上说，此书可说是《拉失德史》的续编（见《瓦理汗诺夫著作选辑》俄文，1958年版，第99—100页）。

段引文整个弃而未译，这是米儿咱·海答儿为了叙述帖木儿时代的历史而采用的；同时某些边注还说明厄斯金先生在许多章节中，不能肯定原著者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只有重行翻译一个新的译本了。于是，我就到可能对米儿咱·海答儿原著有所了解的唯一部门去征求意见。查尔斯·李约博士在编制他的英国博物馆东方文字手抄本目录时，曾彻底审阅过《拉失德史》，而且叙述了其中的内容；他了解这本书的困难，同时也看到如果想把厄斯金先生的文稿加以扩充和拼凑，其结果将很不完善。承蒙他的推荐和帮助，我得到了他以前的学生罗斯先生的协助，着手重新翻译；尽管罗斯先生是巴黎现代东方语学院波斯语系毕业的，而且得过乌斯列奖学金，但是我相信，关于他的熟练程度，只要有李约博士的推荐，就不需要更好的保证了。无庸赘言，这个新译本广泛地运用了厄斯金先生的《摘要》，罗斯先生从其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和帮助。

xii 翻译工作是从1894年开始的，用了七个月的时间译竣。所采取的方法是由罗斯先生每次把大约五个对开页的章节译成英文，译时一般都把意思模糊或不能肯定的段落留下。然后由我和罗斯先生一道，共同复看每一章节，看时通常总是拿着某一个原本核对。接着我们一起讨论不能肯定的段落，把它们补译出来，或标上记号，留待以后研究。但修改英文、增加脚注以及解决本书中比比皆是的疑难问题等工作，都是留给我后来处理的。在编辑英译本的过程中，我的目的是使文句明白晓畅，而又不因改动译文致失作者原意。但这证明并非始终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有许多段落要不损作者原意，就只能对译文略作修改。一般说来，允许变动的余地确实很小，因此必须把许多句子和段落以病句的形式保留下来；如果著者的原意允许的话，改动这些病句倒并不难，而且甚至是令人禁不住想动一动的。

就专名的拼写来说，最初打算所有的专名全都按照英国博

物馆所用的系统重新拼写，这是一种严谨的逐写法，按照这种逐写法，在英语中没有严格相当字母的每个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字母都用重音符号或分别发音符号表示出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实际上，翻译工作刚一搞完，罗斯先生就离开英格兰到欧陆去继续从事其东方学的研究，试图统一拼写法的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我发现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执行原来的计划，因为许多名称必须从各种方言原文中重新找出——要做这项工作，我就不得不时常到英国博物馆中去。因此，我决定完全按照W·琼斯爵士的简单方法来写，也就是按照印度政府在他们的官方文件和出版物中所采取的系统来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系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并不能每次都严格地表明它所表示的词的波斯拼法或阿拉伯拼法是怎样的，所以就不能提供完整的线索，使那些单词还原；不过这个系统尽可能接近地标出了正确的发音，其正确程度在实际应用上也够了^①。此外，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好处是简单明了，不像那更 xiii 为完整的系统一样，使得不专门研究东方语言的读者时常感到有一种学究气，而且令人讨厌。另一方面，那些熟悉这些有关语言的读者却并不要求告知，原著者对这绝大多数名词是怎样写的。仅有的例外是用这一系统所拼写的少数新的和不常见的地名，但是这类地名在原文中一般写得非常潦草而不完全，即使能够标出精确的对音，也没有多大的价值。

① 其标音方法可以叙述如下：为了标明单词father中a这一字母所发的声音，就在a上加重音符号；而其他元音（正如H·G·基恩先生简要说明的那样）则是“用‘ruminant’和‘obey’中的英语发音表示的”（见《东方人名词典》第vii页）。可以补充说，在结论和脚注中，那些经常使用和众所周知的名词的拼法与英文作品中常见者相同，而在本文中则采取著者所写成的样子。因此，在本文中可以见到Babar（巴布尔）、Dehli（德里）、Gang（恒河）等等，而在其他地方这些名字却写成Baber、Delhi、Ganges 等等形式。

在我尽力阐明著者的叙述以及与其所述地区民族与地理情况有关的题材时，我尽可能地利用了这样一些作者的权威著作，即这些作者所述之材料能从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引到，并可以核对。对米儿咱·海答儿所叙述的所有部落和种族，以及大部分地方，我个人虽多少有所了解，但是读者或许会觉得能参考一部业已出版的权威著作，总要比依靠编者的回忆更为满意。这话仅仅是指一部分脚注和绪论而言。因为对一切历史事实来说，无论如何都要参考公认的权威著作。

须要指出的是：本书转译米儿咱·海答儿在本书开始部分所引用的《帖木儿武功记》的大段引文时，没有根据海答儿抄录的文字。这些章节是罗斯先生根据英国博物馆所存该书原文直接翻译的，只仍然添上了米儿咱的插文（这项插文在好几个地方反复出现），这插文说《帖木儿武功记》著者称之为“察台”的国家也就是“蒙兀儿斯坦”。至于佩替·德·拉·克鲁阿所译的很不忠实的《帖木儿武功记》法译本，我们除了用来对照专名以外，没有作其他用处。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罗斯先生的译文要比二百年前的法译本完善得多。我们将这部分

xiv 译文按米儿咱·海答儿原来的次序逐章逐节地插入全部译稿中，并没把章节的次序打乱。但印刷字体较小，以示与原著不同。

关于本书所附地图只需要简单地说明几句就够了。首先，它的目的是要把《拉失德史》中可以确实查明而其方位又能确定的地名都表示出来。其次，书中所提到的地区显然必须根据能够得到的关于该地区自然地理的最好的资料标绘出来。但是，一幅地图如果仅仅包括米儿咱·海答儿说到的那些地名，就太没有意义了。为了表明这些地名的位置，就需要再标绘某些容易识别的地点以为指导，因此，我们使用了现代地理中若干最普遍知道的和关系最密切的地名。这些地名以相当宽的间隔标在所指的全部地区上，大部分可以看做是指明作者所说地

方的“标杆”。

初看起来，这幅地图如果把各部落名称加进去，标出他们居住的地区，并把各个国家和王国的国境或疆界概况标示出来，便会更为有用。但是，在一单张图纸上实不可能提供这类的资料，因这类资料所欲说明的时期持续达二百年以上。这部历史所要说明的全部主旨是“世事沧桑”；要表明各时期的疆界和各部落的迁移情况，就要一系列地图而不只是一幅。因此，我们觉得最好是把一切性质变易不定的材料从地图上删掉，宁愿使它成为单纯的地理图幅。

至于其他方面，一切都是为了使这幅地图明晰而且容易查阅；为此目的，一切不必要的细节——不论是关于专名的还是关于自然地貌的——都略去了。我相信这幅地图会被认为是包括了中世纪中亚史著作中提到的大部分地名的唯一的一幅地图。原图是H·沙尔鲍先生绘制的，在同类地图中本图可以说是清晰而卓越的。

在我工作的各个阶段中，曾有许多人惠予协助，谨此表示感谢。最使我衷心感激的是亨利·霍渥斯爵士，他对本书始终一贯关怀，并见之于许多实际行动，没有这一切，这部手稿是否能够付印还是个问题。李约博士的大力协助我已经提到过了；但在这儿必须志谢的是，他在翻译技巧上对我本人和罗斯先生都曾慷慨而耐心地给予帮助。我对斯蒂芬·惠勒先生同样也要表示谢意，他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并且给我介绍了许多书籍和文献；他对大部分亚洲问题学识之渊博，可说是罕有其匹，因而便能十分慷慨地为我提供资料。我还要向L·A·沃德尔博士致谢，他为读者帮了一个忙，那便是给米儿咱·海答儿有关西藏的几章加了一些注解，读者只要看一看他那本卓越而独到的《西藏的喇嘛教》一书，就保证会对他的说法感到钦佩。此外，女王陛下的印度事务大臣曾慷慨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

保证本书的出版，谨此并志谢忱。

最后，原著者曾向读者声明，他深知自己的书中讹误很多，这句话我必须重复提出。我主要请批评家鉴谅的问题是亚洲人地专名的拼写问题，不过由于没有反复仔细地校订清样（这是这类书籍所要求的），还可能有其他的错误和疏漏存在。我的假期有限；这项校订工作必须在我离开英格兰回呼罗珊以前做完，所以某些地方难免仓促草率。

米儿咱·海答儿还告诉他的读者们说，除了蒙兀儿人以外，没有人会对这部历史感到兴趣。我们希望他的预言并不完全正确。总会有为数不多的人，尽管他们不是蒙兀儿人，但认为他的著作保存下来是有用的，且可从中，甚至从英译本中发现某些引人入胜之处；至于，这些人对于一个不很了解著者语言的编者能够以多大的耐心予以对待，就是另一问题了。可以设想，一个人要阐释某本著作，就必须精通该书的语言，这才能够理解其内容之真意，并正确地了解它的宗旨。情况有时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位德国诗人说过：

“谁欲了解诗人之衷肠，

xvi 谁就应当游历诗人之故乡。”

这两句诗如果有任何可取之处，我敢说本译文就是一个例子，说明除了语言以外，还有某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正确阐述著者的原意，并了解他的宗旨。

N·伊莱亚斯

于东方学会

1895年3月25日

P1

英译本说明

《拉失德史》的作者把该书第一编叫做“正史”(Tarikh-i-Asl)，把第二编叫做“史迹概述”(Mukhtasar)。

第一编是在第二编写完之后写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在第一编的某几个地方提到他在第二编中已经写过几节文字；同时，在第二编中他也预先说将要在第一编叙述某些事情。

英译本选用的专名拼写系统，见编者序言第X和XI页中的说明。

英译本编者序言(第XI页)中也已提到，《帖木儿武功记》的引文排印字体较小。但是《世界征服者传》的引文在排印上并无区别。《帖木儿武功记》的引文(除第二编第九十九章中一节非常短的引文而外)，是根据该书原本而非根据海答儿的抄录翻译的；而《世界征服者传》(虽然也用该书原本核对过)则是根据米儿咱·海答儿在《拉失德史》中引用的文字译出的。

本文中的普通括弧，即圆括弧，都是原著者的插文。浅方括弧中的字是译者或编者加的，目的在使该节的英语行文完整，或使文意通畅。深方括弧内的单词或句子是突厥文译者的插文，或其所更换的文字，这是用突厥文本和波斯文本核对后添入的。这些深方括弧中的插文从第177页开始出现，往后断断续续地一直到本书末尾都有^①。

英译本本文中所加的脚注，凡标有R字处都是罗斯先生加

① 为了便于辨识波斯文原本和突厥文译本的区别，在汉译文中将深方括弧予以保留(用〔〕表示)；同时用〈　　〉符号代替英译者的浅方括弧。但有时为译文通顺起见，括弧内的单词略有增减。{　　}系汉译者所加，与原书无关。——译注。

的。绪论第四章中标有H·H·处是亨利·霍渥斯爵士加的。本文第八十九到九十一章，关于某些西藏问题的脚注，是由L·A·沃德尔博士加的，签有他本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余的脚注都是编者加的。